

国际观察

约翰逊“脱欧”：换汤不换药的戏码

英国首相约翰逊为了脱欧，也是用尽了“洪荒之力”。10月31日，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为了能够顺利脱欧，约翰逊通过女王让议会休会，减少反对无协议脱欧的议员的阻力。尴尬的是，约翰逊在议会辩论时，有保守党议员在大庭广众之下选择了“叛逃”，约翰逊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同时议会剥夺了约翰逊的议程控制权。首相与议会之间的斗争并没有随着约翰逊取代特蕾莎·梅而结束，同样的戏码，不过换了主角而已。如今，特蕾莎·梅坐到了议会的后排，而约翰逊则坐在了首相的位子上。

文/孙兴杰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达成了双方尚能够接受的协议，对于脱欧来说，也算是一种软着陆。而现在约翰逊的无协议脱欧其实是推翻了耗时两年的脱欧协议，这对欧盟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甚至是冒犯。然而，这就是约翰逊的方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样，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无协议脱欧，对英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英镑的稳定会造成压力，同时，伦敦金融城也会受到影响。但是，欧盟的损失也不小，英国是欧元区第二大出口市场。另外，现在的欧盟也是“艰难时刻”，法国、德国、意大利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加上欧盟领导

人处于换届之中，也是欧盟最脆弱的时刻。特朗普不止一次批评时任首相特蕾莎·梅脱欧谈判的套路不对。现在约翰逊上台之后，英国脱欧无疑成为平衡美国和欧盟的力量，而约翰逊本身就对欧盟没有好感，现在以无协议脱欧来逼迫欧盟让步，也是约翰逊的小算盘。

约翰逊是非常激烈反对现有的脱欧协议的人，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三次在议会中被否决，与约翰逊这样的死硬派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北爱尔兰的后方案，因为留了一个口子，防止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出现硬边界，也是为英国进入单一市场和共同关税区提供了后门。这一方案带来的成本或者代价是什么呢？一是北爱尔兰的问题，英国好不容易将北爱尔兰的形势稳定下来，后方案无疑会让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的关系有进一步发展。二是无协议脱欧之后，英国就获得了自由，可以进行新的贸易协议的谈判，脱欧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

丝毫不用怀疑，约翰逊脱欧的意志是坚定的，但他面临着与

特蕾莎·梅一样的难题，那就是悬置的议会形成了“否决政治”，议会变成了争吵和否定的地方，无论一个方案有没有建设性，都难以通过。之前议会就脱欧问题达成的最大的共识就是反对无协议脱欧，而现在约翰逊无论是真的无协议脱欧，还是以此作为对欧盟极限施压的筹码，都希望突破这个底线。无疑，此举打破了议会的脆弱平衡，议会再次通过了阻止无协议脱欧的法案。法案要求，英国政府要在下个月与欧盟达成新的脱欧协议（几乎没有可能），或者在得到议会同意之后无协议脱欧（也基本不可能），但是如果是在10月19日之前不能实现两者之一，首相约翰逊必须致电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要求延期脱欧至2020年1月31日。脱欧，再次变成了拖欧！

约翰逊首先想到的是以议会休会的方式把反对派拖垮，其实也是增强首相的权威，但是议会结束了夏季休会之后，约翰逊遭遇了特蕾莎·梅一样的窘境，不仅反对党施加压力，工党领袖科尔宾也反对提前大选。保守党内已经涣散，如同当初约翰逊反对特

蕾莎·梅一样，保守党内也有不少议员反对无协议脱欧，也就是说在脱欧问题上，保守党内并无共识。保守党曾对特蕾莎·梅进行过不信任表决，现在约翰逊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比特蕾莎·梅更加艰难的是，约翰逊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没有议会的支持，没有执政党的支持，约翰逊的雄心壮志面临的是层层叠叠的反对。

可以说，脱欧虽然是英国与欧盟关系的调整，但是真正的根子在国内，尤其是保守党内部。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重启”。怎么重启呢？也就是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约翰逊上台之后，保守党的支持率在上升。提前举行大选，脱欧的日程可以延后，如果保守党能够赢得多数席位，那么约翰逊可以建立自己的权力基本盘。这样的场景在特蕾莎·梅担任首相之后也发生过，其在2017年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呢？保守党惨败，虽然是第一大党，但是丢掉了多数席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建了执政联盟。

约翰逊要求提前大选，但是需要得到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同

意，结果呢？被议会无情地拒绝了。约翰逊指责科尔宾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反对派投票表明对政府有信心，拒绝举行大选。约翰逊的指责也有道理，如果现在举行大选，保守党要是赢了的话，工党及其在野党就失去了对脱欧议题的控制。脱欧变成了保守党与工党、约翰逊与科尔宾之间的斗争。

当然，即便提前举行大选，也不能保证保守党能够赢，一旦输掉大选，或者不能获得多数席位，约翰逊可能成为一个短命的首相。约翰逊愿意赌一把，但是没有人陪他玩。从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政治失去了确定性，政治过程中充满了权宜之计，各方也将政治程序中的极限状态挖掘出来了，因此，约翰逊也在考验英国政治制度的韧性。约翰逊已经提出，脱欧对英国来说“不成功便成仁”，这对于保守的英国来说，是非常激进的政治口号，但是，英国人也被悬置的议会折腾够了，而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未来交由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来决定，这并不是民主，而是精英的懒惰与逃避。

核心话题

公司是否只应追求股东价值？

对于美国上市公司的很多投资人来说，近期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公开声明是令人震惊的。在这份包含有181位首席执行官签名的声明中，摩根大通、苹果、百事可乐、沃尔玛等跨国公司宣称，他们商业经营的目标将不再是最大化股东价值。他们认为，虽然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目标，但是他们对每一个利益相关方负有共同的承诺。他们呼吁为了公司、社区和国家的成功，要为各方都能创造价值，特别是那些并未拥有公司股票的人。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说，美国梦仍然存在，只是正在崩溃，未来的商业目标应该包含对员工成长的投资、保护环境、公平和道德地与供应商交易等广泛内容。

文/魏欣



作者为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经在他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清晰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商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如果商人们宣称他们的企业具有“社会良知”，并认真履行提供就业、消除歧视、避免污染以及其他可能成为社会改革者的责任时，他们已经不再是经营一个公司，而是在运营一个政府。商业圆桌会议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这个理念，即公司的唯一责任就是增加投资人的回报。

如果从美国社会过去这几年的变化来看，这种商业态度的转变是在大公司面临强大社会不满

的前提下发生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社会中积聚了对于收入不平衡、伪劣产品和恶劣工作环境的愤怒。这其中有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他们一直在谈论大企业在经济权力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作用。伊丽莎白·沃伦认为把股东利益作为企业首要目标造成了经济不平等，并且以牺牲工人为代价来充实了富裕的投资者。沃伦去年甚至提案要求大公司董事做决策时要照顾到各利益相关方。哈佛商学院历史学家南希·克恩认为，这些CEO正在回应时代精神中的某些要求。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继续像过去那样的商业行为已经越来越不被社会接受。但这将会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对于未来将如何做，这些公司并没有给出比较清晰的答案。

很多大公司近几年都在各个社会热点问题上成为民众指责的焦点，所以表态支持这种观点成为了他们挽回公共形象的一次努力。比如，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枪支零售商之一，只要发

生枪击案件，沃尔玛都会成为国会和新闻媒体重点指责的目标。但是由于庞大的社会需求，他们不得不在利润与公众影响之间艰难平衡。本月连续发生在各州的枪击事件迫使沃尔玛不得不做出决定，停止销售进攻性的手枪和步枪。亚马逊和迪士尼则由于支付员工的工资过低，导致部分员工不得不向联邦政府申请社会救助来维持生活。这相当于使用纳税人的钱变相补贴了本已盈利颇丰的企业。亚马逊还由于向美国邮局支付的快递费用过于低廉而遭致总统特朗普的批评；由于造成了西雅图市区的房价上涨遭致了当地市民和纽约议员的反对。脸书公司由于在未经理用户允许的情况下，泄露他们的隐私给剑桥分析公司进行政情分析，遭到了很多网民的抵制。

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使大公司的管理团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各界批评的对象。如果从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来看，2018年标普500成分公司的CEO们每年收入是他们本公

司普通员工收入中位数的287倍。这个比例在上世纪60年代还只有20多倍，在90年代也只有50多倍。现在平均每个CEO的收入是1450万美元。即使国会通过了旨在限制CEO薪资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后，他们的薪水在过去10年中还是增加50万美元。而且越是大量使用临时工和低薪员工的企业，CEO与普通员工的薪资差距就越大。这其中最大的是特斯拉，CEO马斯克的薪水是普通员工的40668倍。服装品牌GAP达到3566倍，麦当劳达到2124倍，鞋类零售商Foot Locker达到1627倍。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普通民众面临生活困境的时候，这些数据大幅增加了社会对大公司的愤怒。一部分人把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归咎于里根政府降低低收入阶层边际所得的政策。

这种营商理念的转变也在美国社会的保守群体中遭致了广泛的批评。特拉华大学温伯格公司治理中心主任查尔斯·埃尔森说，这种对任何人都要负责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任何人不负责的。他曾经担任过

数家公司的董事和律师。他认为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可能破坏了公司治理中的管理责任。在声明发表之后几个小时，机构投资者理事会表示，商业圆桌会议正在努力削弱股东权力，现行法律机制不足以支撑管理层对股东以外的人负责。CEO们希望更多地掌控公司，但不希望受到股东的制约。

从更深入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当美国民众的分裂使国会无法在很多社会议题上达成共识时，一部分人把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涉及这些问题的大公司。这种现象广泛体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控枪问题、企业垄断问题、网络隐私问题和言论自由问题等。可以想象，签署这份声明的CEO们在明年连任时，仍然只能得到来自股东的授权。所以，他们对其他社会群体负责的宣誓在很大程度上只会成为一种理想，或者一种公关行为。任何让商业机构承担不明确社会责任的企图，最终都只会让企业管理滋生腐败。社会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立法机构。

热点话题

中国城市GDP百强榜揭开区域经济两大规律

日前，有媒体就整理出了2019年上半年城市GDP百强榜单。榜单显示，北上深广的竞争格局依旧稳固。天津、重庆稳居二线城市前列，不过增速依旧低迷，其中天津只有4.6%，重庆只有6.2%。四大一线加两大直辖市，正好是上半年GDP破万亿元的六个城市。

文/熊志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GDP十强剩下的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则一路追赶，其中成都、武汉上半年的增速都超过8%。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的马太效应继续扩大，二十强城市以东莞为界，经济总量达16.16万亿元，在全国的占比达到35.84%，较去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

那么除此之外，从上半年GDP百强榜的分布、排位看，还有哪些宏观的趋势性规律？第一个规律是，相较于直辖市，或者行政等级较低的一般地级市，省会城市表现出了越来越生猛的气势。

具体来看，GDP二十强城市中，省会城市一共有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长沙、郑州、济南8个，其中上半年增速最低的是杭州，为6.9%。其他省会城市全部不低于7%，像成都和长沙，

也即GDP全省占比都为37.72%，长沙也有30.21%。

为什么省会城市成为了火车头呢？这是因为，相较于苏州等普通地级市来说，省会城市能够聚集全省的资源，在政策项目、产业布局上获得优先考虑。

而相对四大直辖市，强省会战略下的省会城市，有着更广阔的腹地和市场。

随着强省会战略的继续推进，未来尤其是内陆的省会城市，还将越来越强势。对内陆省份来说，尽管这种模式会造成发展不均衡，比如整个四川只有成都入围百强榜，但面对沿海地区的激烈虹吸，集全省之力来打造头部城市，吸引人口、资本的回流，也是种无奈之举。

第二个规律是，南北差距继续扩大，以秦岭淮河为界限，高速增长的城市多数集中在南方。

不久前，“中国真正的差距在南北，不在东西”就引发过广泛讨论，从上半年的GDP百强榜单来看，这种趋势继续维持。比如前十强城市中，只有北京、天津2个北方城市，北方第三城青岛要位列12名；前二十强城市中，除了北京、天津、青岛，只有

济南，共4个席位。

就增速来看，依旧是南方城市领风骚。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除了沈阳、长春未公开数据外，其他13个城市中，增速高于8%的成都、武汉、南京、厦门4个城市都在南方；增速低于7%的杭州、大连、宁波、青岛、哈尔滨，除了杭州、宁波，都位于北方。

就上半年的增速来看，南北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跟改革开放初期的格局形成了鲜明

对比。彼时的经济重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南移，东北地区作为工业重镇，一度成为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

北方城市掉队，越来越跟不上南方城市的步伐，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过于传统。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它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在今天，资源型产业既面临着产业链低端、国际能源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压力，因此出现了大

量的资源枯竭型城市。

另外，和更早接入全球版图、风气更加开放的东南沿海相比，北方城市普遍面临着思维相对保守、营商环境不完善的局面。

未来的北方城市，如果不能尽早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且在营商环境、市场意识上实现观念的升级，在南方城市势如破竹的奔跑中，还会被拉开更大的差距。

海淀区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按照海淀区政府统一部署，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全区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现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一是加强领导，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工作新格局。会同相关部门主动谋划，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电梯安全隐患。我局从保安全、促发展、惠民生的高度，早谋划、出实招、求实效，以北京市高风险电梯安全评估为基础，结合区实际，积极创新，构建了“政府统一领导、街镇属地管理、部门综合监管、企业落实责任、社会广泛参与、检验技术支撑”的电梯安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二是多元共治，齐抓共管，有序推进电梯安全隐患治理。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总体原则，坚持多元共治，齐抓共管，有序推进电梯安全隐患治理。

三是发挥统筹作用，精准施策，强化落实。我局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着眼大局，加强统筹。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通过召开培训会、协调会，指导全区各行业、街镇开展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协调解决疑难问题，同时也承担部分重要场所治理任务。我局精准施策，注重服务。在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工作中始终坚持服务百姓、服务

企业、服务其他部门，做到“管、服”结合，以服务促监管、以服务带提升。

四是采用电梯物联网技术，提升科技治理水平。为了满足新形势下电梯安全监管需求，探索创新了“电梯物联网”的监管模式，对辖区内住宅、学校、医院、商场、宾馆、饭店、写字楼等重要场所的3000部电梯进行了物联网建设。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栏